

安徽省“十三五”重点图书

JIN DAI GUO REN CHU GUO JIAO YU KAO CHA
近代国人出国教育考察
YU ZHONG GUO JIAO YU GAI GE
与中国教育改革

方玉芬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近代国人出国教育考察 与中国教育改革

方玉芬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国人出国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改革/方玉芬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50-2690-4

I. ①近… II. ①方… III. ①教育—国际交流—中国—近代—中国
②教育改革—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4679 号

近代国人出国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改革

方玉芬 著 责任编辑 权 怡 责任校对 何恩情 韩沁钊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印 张	1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294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690-4

定价: 4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绪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清末至民国是中国教育逐步走向现代化^①的关键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被卷入到世界教育改革的浪潮之中。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外教育交流史。近代中国对外教育交流的展开,主要是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教习(清末主要是向日本聘请)和邀请国外教育名家来华(民国时期主要向欧美邀请)、翻译出版国外教育理论及出国教育考察等方式进行。目前,关于留学生和来华教习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翻译出版和出国教育活动的研究则比较少见。笔者自进入教育史专业学习以来一直在关注近代国人出国教育考察活动,也基本了解和掌握了这方面既有的研究成果。

不可否认,留学生出国、教习来华、聘请欧美教育专家以及对国外教育理论的翻译等活动都是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虽然它们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互补作用,但是也无法掩饰自身的不足。如留学生群体,由于受到学业、年龄、经历、时间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他们对本国教育的影响会部分滞后,一般要等到学成归国乃至毕业后更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对本国教育发挥重要作用。譬如,清末新政时期,新式教育改革迫在

① “近代化”与“现代化”是中国学者对英文单词 modernization 的两种不同翻译,由此导致了国内学术界在具体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时,间或使用“近代化”一词,间或使用“现代化”一词。教育史学界亦然。虽然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上,有学者以“中国教育近代化”指称;有学者以“中国教育现代化”命名;也有学者以“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定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代化”与“现代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其体现在近代中国教育的指标体系——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发展变革是一致的。鉴于指称“中国教育近代化”及“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学者多数是将其研究的时间下限断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本研究的时间下限则推移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因此本研究以“中国教育现代化”来指称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中国教育变革。

眉睫,唯有派出素有教育经验的官绅出国,才能在短时间内服务于教育改革。这些都是留学生难以办到的。日本教习,除了从事教学工作还为中国教育创造了一定的舆论宣传,如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等方面,但日本教习毕竟是以“外人”的眼光和立场看待中国及中国教育,与中国的实际情形多少有些出入。民国时期杜威、孟禄、推士、华虚朋等欧美教育专家的来华考察亦然。至于翻译出版国外教育理论及著作,主要是从理论的高度介绍、研究国外教育,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然而,百闻不如一见,抽象介绍毕竟没有实地考察来得直观。因此可以说,及时性、针对性、直观性是出国教育考察不同于留学生、来华教习以及理论翻译等交流方式的独有特征,为近代中国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依据和实证资料。

国人出国教育考察活动适应并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方面,教育的现代化要求国人走出国门,因为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唯有走出国门才能真正推动并实现教育的现代化,体现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一个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自觉过程。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然而由于固有文化观念和狭隘思维模式的局限,新式教育的开展举步维艰,教育现代化的征途荆棘丛生。与外人积极主动地踏入中国不同,国人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步伐却是无比沉重的,这无疑是影响中国教育现代化起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人次少得可怜,甚至他们游历考察的书面成果(日记、图经等)在国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然而,既然走出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①甲午战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以往的几次失败相比,这次的伤痛让国人多少清醒了几分。1895—1898年,中国学生和官绅先后开始踏上了赴日游学、游历的征程。20世纪伊始,清廷颁布新政令,新式教育的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中国教育现代化在前期缓慢进程的基础上加快并加大了步伐。为了直接学习到日本教育兴国的经验,大批官绅们被鼓励或自觉地赴日本游历,其规模之盛大,人次之频繁,曾经被时人及史学家誉为“壮举”或“盛举”。^②他们考察归来以后,大都积极致力于新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基本模式,中国近代第

①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总序,第3页。

② 王晓秋:《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23期。

一个学制(《壬寅·癸卯学制》)的颁行,第一个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学部)的设立,第一个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拟定,无一不可归结为考察归来后的成果。“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由于清末一味地模仿日本而确立的教育制度逐步暴露出一定的弊端,需要对其进行不断地补充和修改,于是人们将视野转向欧美国家的教育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再加上时代的变化,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各国教育带来的影响及教育界人士的深刻反思,使得世界各国的教育包括日本在内都在不断地进行革新。关注战后各国教育包括继续关注日本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对原有教育制度的改进。因此,民国时期,赴欧美及日本进行教育考察仍然是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的必要途径。这时期的考察重点与清末较多注重教育制度的宏观大局不同,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华侨教育等众多领域以及众多方位的考察将中国教育现代化推向了新的高度。

由此可见,对近代国人出国教育考察活动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也有利于全方位把握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及特征,也有利于分析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以及近代出国教育考察活动本身对今人的启示。

二、相关研究及说明

同留学等其他中外教育交流形式相比,有关国人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研究相对薄弱,主要集中在对个别出国考察者所撰游记或报告及特定历史时期出国教育考察活动总体特征的历史分析。通过检索国内外各类期刊、学术论文和专著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近代国人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研究取得了如下主要成果。

(一)关于甲午之前国人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此项活动的专门研究不多,主要是因为时人出洋考察的目标和内容基本上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清政府并没有专门考察教育人员的派出,即使是对国外教育情形的记录也是零星地散见于各类综合考察日记或报告之中。因此,对此期出国考察活动的研究呈现出两种类型:一是综合性质研究,即将教育纳入政治文化的大系统下进行研究,如钟叔河的两部著作《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和《从西方到东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王晓秋的两篇学术论文《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23期)和《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学术月刊》,2007年06期),以及

散见于有关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对外交流史及中国近代教育史著作中的部分文字内容。不过,令人惊喜的是,浙江大学周谷平教授的《晚清中国人眼中的异域教育——初出国门的外交官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考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一文突破了以上框架,将西方教育作为特定考察对象进行了专题研究。另一种是个别研究,即对此期出洋考察者中的重要人物如张德彝、郭嵩焘、薛福成等人在考察中所形成的西方文化教育观进行研究,如雷俊玲的《清季首批驻英人员对欧洲的认识》(《中国文化大学1987年,博士论文)、刘甲良的《张德彝西方教育观探析》(《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楼秀丽的《张德彝——一个晚清外交官西方认识的成长史》(《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王春燕,张堂明的《张德彝眼中的西方近代教育——以八部〈航海述奇〉为考察中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6月)、文定旭的《立足传统,融汇中西——郭嵩焘洋务教育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陈嘉梦的《郭嵩焘笔下的西方——基于〈郭嵩焘日记〉的西方形象研究》(《上海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洪炜的《晚清早期驻外公使对西方的观察与思考述论——以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和薛福成为例》(《厦门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等。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此期出国考察的资料大部分都收编在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内,因此以上研究成果均是在此基础上得以成形。该套丛书收集了1840—1911年中国人赴欧美及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后所留存的日记、笔记或游记,先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出版,前者于1980—1983年出版了27种20小册,后者于1985—1986年出版了38种共10大册。因此,这套丛书无疑是今人研究近代国人如何走出国门、借鉴外邦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关于清末新政时期中国赴日教育考察活动的研究

有关这一时期中国赴日教育考察活动的研究成果较甲午之前及民国时期要多出许多,且基本上都是以教育考察为专题对象。据笔者了解,目前研究成果主要如后。汪婉撰写的《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版)算是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在充分占有日文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即考察,下同)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在确立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方面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日本方面于中国教育视察人员的态度及其应对措施。全文以日语行文,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清末赴日教育考察的史实。何生根撰写的《清末日本教育考察研究》(浙江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主要从清末日本教育考察的内容、由教育考察看日本人

的中国教育改革观、张謇赴日教育考察与地方兴学三个方面论述清末赴日教育考察活动;代详撰写的《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教育思想研究——以“东游日记”为中心》(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以清末赴日考察官绅为对象,着重分析了他们在日本考察期间教育思想的发展变化,从中探讨其在中国教育思想近代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他一些研究成果如《吴汝纶的日本教育视察》(王鸣,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02期)、《吴汝纶赴日考察与中国学制现代化》(赵建民,《档案与史学》,1999年05期)、《张謇癸卯东游日本及其影响研究》(蒋国宏,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4期)、《两度瀛山采药归——20世纪初头严修考察日本教育述略》(武安隆,《日本研究论集》2005年)、《清末教育考察对体育的引进及其价值》(陈晴,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09期)、《清末幼稚园教育日本化透视》(方玉芬,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7年05期)等文,都是从某一侧面,如学制、体育、学前教育、实业教育等,对赴日教育考察活动进行的个别研究。另外,一些中外交流史的著作如《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晓秋,中华书局2000年版)、《中外教育交流史》(田正平,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余子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杨晓,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清末浙江与日本》(吕顺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吕顺长,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等著作或论文,均对赴日教育考察有所涉及。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清末赴日教育考察的主要游记资料,大部分都由吕顺长编辑成《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集以及由王宝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晚清东游日记汇编》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赴日教育考察的重要文献资料。

(三)关于民国时期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研究

民国时期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主要有:田正平撰写的论文《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以1912年至1937年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03期)。该论文的前篇主要梳理了民国时期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的基本情况、活动内容及其特点分析,后篇则对照分析了外国来华教育人士的活动及其影响。在田教授主编的《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章(“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中,也有与此相关的研究。杨晓在其撰写的《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章(选择与融合——民族复兴中的教育

成长)也简要梳理了1912—1937年间国人赴日考察教育的线索及主要内容。余子侠、宋恩荣撰写的《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华北卷)》第四章(伪华北政权的留学教育及教育交往)记述了日本侵华期间非常态的赴日教育考察活动,并客观地分析了该活动的奴化实质。另外,谢长法的《黄炎培的教育考察与职业教育在中国的萌生》(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11期)是截至目前唯一的一篇以出国教育考察活动者为个案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他一些关于近代著名教育家,如陶行知、郭秉文、俞庆棠、陈鹤琴、雷沛鸿、俞子夷等的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研究则散见于人物年谱、传记及教育思想研究著作中,如《陶行知年谱》(朱泽甫,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蔡元培年谱长编》(高平叔,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胡德海,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俞庆棠思想研究》(熊贤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余子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俞子夷教育实践研究》(董远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至平至善,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冒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陈鹤琴传》(柯小卫,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

(四)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大多都是受到海外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权威性著述——吉尔伯特·罗兹曼(G.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模式的影响。该书以“知识和教育”为专题,从大众教育、精英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和价值观及国际比较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历程,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本身所存在的影响教育现代性增长的动力因素和阻力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者纷纷致力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类:一类是个体或群体人物研究,如《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田正平,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何晓夏、史静寰,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刘正伟,浙江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教育会社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张伟平,浙江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商会与中国近代教育研究》(李忠,河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苏云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5)等。另一类是区域研究,如《从湖北看中国教育近代化》(董宝良、熊贤君,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张彬,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湖南教育近代化研究(1894—1929)》(伍春辉,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王金霞,河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综析湖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地位》,(余子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第2期)。还有一类是从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外延进行研究,如张平海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分别从中国教育思想的早期现代化、教育制度的早期现代化、教育内容的早期现代化、中日教育早期现代化比较等方面总体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涉及出国教育考察的研究则少见,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近代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开展始终是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考察活动的主体即是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因此,将出国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联系起来研究确有必要。另外,在近代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史中,学者们习惯性地将晚清与民国时期(抗日战争之前,下同)的交流国别定位为:清末——日本、民国——欧美,实际上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尤其是教育考察活动的开展自清末至民国始终是一贯的(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态的敌对关系除外)。民国时期,中国赴日考察教育人次从总体上来说一直多于赴欧美教育考察活动的人次,这应该归结为两点原因:其一是常理中的路近费省;其二则是日本自始至终都在关注世界教育并积极致力于教育的不断革新,仍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系。

三、研究的核心概念

出国教育考察是指国人走出国门对世界各国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等多方面进行参观与研究的一项活动。这种活动一般是因时代背景与教育自身需要而发起,带有很强的随机性,“或委派、或委托、或常任、或临时”,^①或考察者事出己愿。因此,出国教育考察不同于国内进行的教育视察或教育视导,后者随着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职能的明确逐步走向正规化,形成了专门的视导制度以及对视导制度的专门研究。出国教育考察在清末习惯称之为“游历”,对应的留学称之为“游学”;民国以来,则习惯将二者分别称之为“考察”“留学”。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者陈青之曾对晚清的游历和游学做过比较:“游学是长期的永久的性质,游历是短期的暂时的性质;游学所选派的概属于青年子弟或学生,游历所派遣的多为亲贵或职官;游学以正式研究各种科学为目

① 江苏省公署教育科编:《江苏教育近五年间概况》,江苏省公署1916年印行,第15页。

的,游历的目的则只在考察各国的政治法度(清末时期的教育涵盖在笼统的政治之中),以便期月回国后立行新政之急需。”^①陈青之先生的确道出了特定历史时期游学和游历的基本区别,但是若以此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史上的游学(留学)与游历(出国考察)活动的绝对依据,则显得过于笼统。留学与出国考察在时间上存在长短之异,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若以年龄大小作为二者划分的依据则有失偏颇,如蔡元培 1907 年以 39 岁的大龄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张伯苓 41 岁(1917 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另外,在留学或游学中也有考察的情况,如部分留(游)学生利用假期空闲时间对所在国的教育进行考察,亦有部分中青年留学生在未出国门之前即有过一段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和基础,因此在外留学期间十分注意对所在国的教育情形进行考察研究。这种活动亦应列入考察之列,如余家菊 1922—1924 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多次考察英国各类教育。因此,本研究所确定的研究对象是所有教育专门考察人员与有意考察教育的其他人员及其考察活动,但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主要以素质教育行政、教育教学经验或经历的专门出国考察教育者及其活动为主体。因此,一些著名教育家如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晏阳初等,虽然都曾有过出国的经历,并且对所到国家的教育均有所论及,但由于篇幅所限,均不作详细分析。鉴于“考察”与“考查”两词在语音及语义上几乎一致,因此考察者中时有使用“考察”一词,时有使用“考查”一词。为统一起见,本文一律以“考察”一词行文。也有民国时期的一些出国教育考察者习惯将其考察活动以“调查”称呼,本文除在引用原文时继续使用“调查”一词外,其余一概转换成“考察”一词。

晚清民国时期出国考察教育者的人数甚多,身份各异。从成员组成来看,既有独自出行的,亦有结成团队的,以后者居多。从派出组织来看,既有官方派出的,亦有民间自动发起的,以前者居多;前者又可分为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机构,后者主要为民间教育团体。从经费来源来看,既有官费的,又有自费的,以前者居多。从考察的国别来看,主要是赴日考察、赴欧美考察及赴南洋考察三大类。从考察者的身份来看,既有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官员,亦有学校校务工作的主持者,另有留学生和不以考察教育为职的他类出国人员。从考察的内容来看,主要分为考察教育行政、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平民教育、教学管理、教学法、

^① 陈青之著:《中国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3 页。

体育教育、电影教育、图书馆教育等类别,以教育行政、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居多,亦有以上综合考察性质的。本文主要是按照出国教育考察活动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为线索进行论述,因此,在行文的时候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并以教育考察国别为参照进行重点研究,如洋务运动时期以欧美教育考察为主,维新及新政时期以赴日教育考察为主,民国时期兼顾赴欧美、赴日本教育考察。

四、拟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及不足之处

中国教育现代化,又被学者称之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或教育近代化。当代著名学者田正平教授将其定义为:“它(中国教育近代化——引者注)指的是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换句话说,它指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中国通过多次的教育改革,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改造、更新传统教育,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历史历程。”^①这种教育改革,既体现在教学内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手段等物质层面,也反映在教育观念、教育理论等思想层面。正如著名学者章开沅所指,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指的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教育总体转型”,它“涉及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②通过中国近代教育在内容、制度、思想上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可以确定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历史分期就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分期。

田正平教授在《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明确地将中国近代教育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62—1894年,为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期;第二阶段,1895—1911年,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期;第三阶段,1912—1927年,为近代新式教育的成熟期。^③田正平教授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分期划分的科学依据是近代新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有

①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现代化丛书·总前言》,第7页。

② 章开沅主编:《中国教育现代化丛书·总序》,第2页。

③ 参见田正平:《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2期。

关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将近代新式教育产生期的下限确定为 1894 年而不是 1901 年,可以明显地将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与维新时期的教育区别开来,但又模糊了清末维新时期与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显著差异;而以 1927 年而不是 1922 年作为近代新式教育的成熟期,则是将《壬戌学制》的确立与修订融合在一起,容易忽略民国后期的学制改革实质上都是对《壬戌学制》进行修订的事实。近代教育家周予同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中曾将中国近代教育(即周予同所言的“现代教育”)分为五期:第一期,1862—1901 年,为新教育萌芽时期;第二期,1901—1911 年,为新教育建立时期;第三期,1911—1921 年,为民国学制颁行时期;第四期,1922—1927 年,为新学制的修订时期;第五期,1927—1932 年(即至周予同撰写《中国现代教育史》之时止),为党化教育试行时期。^① 笔者倾向于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分期方式,但鉴于周予同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完成《中国现代教育史》一书的,所以有必要将周予同关于“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下限延长至 1949 年,并将第四、五两期合并为一期,体现《壬戌学制》自建立以来不断进行修订的连续性以及民国教育界人士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的历程。因此,笔者将中国近代教育史或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分期确定为:第一期,1862—1901 年,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第二期,1901—1911 年,近代新式教育的确立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初步发展阶段;第三期,1911—1922 年,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继续发展阶段;第四期,1922—1949 年,近代新式教育的定型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成熟阶段。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时代背景及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教育现代化形成了以下四大特征:一是由被动性转向主动性。中国教育现代化是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完成的。日本及欧美教育的刺激是外因,中国教育自身求发展的需求是内因,外因驱动内因的产生并通过内因起决定作用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前进的步伐。二是教育发展的区域性,即教育现代化所显示出的局部性和不平衡性。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精英与教育精英的作为,使得清末的湖北、直隶与民国的江苏在教育上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教育现代化的不平衡局势。三是教育制度的模仿性。相对于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及教育理论而言,对外

^① 参见周予同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民国二十三年(1934)版,第 13~14 页。

国教育制度的模仿显得更加直观、直接和显著,清末的《壬寅·癸卯学制》、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20世纪20年代的《壬戌学制》,无一不是在对日本、德国及美国学制的模仿基础上形成的。四是教育研究与实验的探索性,中国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开展的各类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及其他教育实验运动都是在学习、借鉴欧美及日本教育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形而开展的,在效法他国的过程中凝聚了中国教育界人士勇于进行教育研究与实验的探索精神。因此本文主要从出国教育考察活动与中国近代学制建设的关系、出国教育考察活动与近代中国地方教育发展的关系、出国教育考察与中国近代教育研究与实验三方面,论述出国教育考察活动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并由此体现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一个由被动转向主动的发展历程。它体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既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自在的历史运动,又是一个主观能动的自为的历史运动。

本研究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近代中国出国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互动关系。自起步之日起,即京师同文馆设立之日起,中国教育现代化就与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结下了“生死之约”。同治元年(1862年),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设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然而,新式学堂如何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培养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仍是一个未知命题。四年后,即同治五年(1866年),六十三岁的山西襄陵知县斌椿率领该馆学生赴法、英、荷兰、丹麦、瑞典、俄、普鲁士等国游历,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域外求经。这是近代中国官方派遣的首次游历之行,也是近代出国考察活动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应如何发展的第一次回应。至甲午战争之前,洋务领袖们在天津、福建、广州、湖北等地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然而这些零散的新式教育机构既不能在形式上形成完整的学校系统,又在内容上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进行指导,因此甲午一战即暴露出新式教育在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上的先天不足,中国教育现代化首途即遭挫折。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应该如何前进才能避免战争形式上的惨败,洋务后期领袖人物张之洞及维新派纷纷主张以游学或游历的形式来寻求教育发展的空间,以达到增强国力、民力的目的。清末新政时期,朝廷颁布兴学诏书,然而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兴学运动无章可循,于是清政府朝野内外一致将目光锁定近邻日本,赴日教育考察活动呼之欲出。这是出国教育考察活动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需求的第二次回应。在赴日教育考察活动的影响下,统一全国学校系统的《壬寅·癸卯学制》和指导教育发展方向的五项教育宗旨相继出台,

中国教育现代化得以继续发展。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兴政权重新给予教育界人士以冷静反思的机会,他们开始注意到清末时期的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方向出现了偏离,即一味模仿并移植日本教育制度并不能带来中国教育的长足发展。然而匆促之际制订的《壬子·癸丑学制》依然未能扭转这一局面,于是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先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制改革大讨论,众多教育界人士再次将出国考察作为制订新学制的重要途径与依据。这是出国教育考察活动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第三次回应。在考察日本、欧美尤其是欧美的教育制度后,酝酿已久的新学制终于制订出来。然而由美国“引进”的《壬戌学制》也因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而逐渐暴露出很多弊端,于是民国后期对学制的不断修订以及由此引起的教育实验与研究活动广泛开展起来,由此也激发了国人考察欧美教育以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改革的热情。

鉴于笔者目前掌握的已有研究成果和搜集到的相关资料的情况,初步将研究的时间范围确定在 1866 至 1949 年,即清末民国时期。其间,清末新政十年是出国教育考察的第一次高潮,民国时期虽称不上什么高潮,但一直是溪流涓涓不断,偶尔也出现过几股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小浪潮。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个案分析法。以文献法分析近代出国考察的历史成因以及演变过程,分析考察成员的各类考察报告、日记、讲演的内容及其对新式教育的影响;以比较法和因素分析法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出国考察的历史背景和考察特征;以个案分析法研究出国考察教育人员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的不足之处甚多:其一是对阶段性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特征把握不够,其原因在于研究时段较长且不对称,即清末新政时期较短,且出国教育考察活动较为单一、集中,活动特点容易把握;民国时期较长,但出国教育考察活动比较分散、复杂,活动特点不易把握;其二是对中国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理论分析不够,尤其是民国时期出国教育考察活动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分析不够,虽然笔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询到了甚多的出国“考察日记”或有关教育考察的“消息报道”,但其中的大多数都只是单纯的考察流程的记录,加之未能搜集到充足相关的外文资料,因此可供本文进行理论分析的资料仍显不够。另外,本人浅薄的学术功底也是本文理论性不强的重要原因。

目 录

绪论	(001)
----------	-------

第一章 十九世纪末国人出国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变革	(013)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出国教育考察活动概述	(014)
---------------------------	-------

一、专门游历官员出洋考察	(017)
--------------------	-------

二、外交使臣出洋考察	(022)
------------------	-------

三、民间人士出洋考察	(025)
------------------	-------

第二节 甲午战争前游历人员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与吸纳	(026)
--------------------------------	-------

一、游历人员对西方教育的认识	(026)
----------------------	-------

二、游历人员对西方教育的吸纳	(037)
----------------------	-------

三、甲午战前出国教育考察活动评析	(043)
------------------------	-------

第三节 甲午战争至维新时期出国教育考察活动概述	(048)
-------------------------------	-------

一、甲午战争至维新时期赴日教育考察概述	(048)
---------------------------	-------

二、甲午战争至维新时期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特征	(055)
-----------------------------	-------

三、甲午战争至维新时期出国教育考察活动评析	(059)
-----------------------------	-------

小 结	(061)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国人出国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改革	(063)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赴日教育考察活动概述	(063)
----------------------------	-------

一、清末新政时期赴日教育考察政策	(063)
------------------------	-------

二、清末新政时期赴日教育考察活动概观	(068)
--------------------------	-------

三、清末新政时期赴日教育考察的书面成果及考察内容	(076)
第二节 赴日教育考察与清末学制的建立	(082)
一、罗振玉赴日教育考察与清末学制	(084)
二、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与清末学制	(096)
三、其他赴日教育考察活动对清末学制的影	(104)
第三节 赴日教育考察与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教育改革举例	(105)
一、赴日教育考察与新政时期湖北地方学制的定型与推广	(106)
二、赴日教育考察与新政时期直隶地方学务的推广	(121)
小 结	(136)
第三章 民国前期国人出国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改革(1912—1922)	(139)
第一节 民国前期出国教育考察活动概述	(139)
一、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重启	(139)
二、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言策	(141)
三、出国教育考察活动的类别	(144)
第二节 民国前期出国教育考察与壬戌学制	(159)
一、郭秉文对欧美学制考察的建议	(160)
二、学界关于学制改革的论争	(162)
三、日本学制考察	(164)
四、欧美学制考察	(170)
第三节 民国前期出国教育考察与近代教育研究及实验	(181)
一、清末新政时期四人考察团与单级教授法	(181)
二、俞子夷欧美教育考察与欧美教学法的输入	(184)
三、黄炎培出国教育考察与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187)
小 结	(199)